

长台关楚简学派性质问题研究综述

张 磊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6年9月2日；录用日期：2026年9月17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13日

摘 要

长台关楚简是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国墓葬中出土的一批战国竹简，在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被发现之前，曾长期被视为唯一存世的战国竹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该墓出土竹简共两组，第一组为竹书，第二组为遣册，学界对此分类并无异议。然而，关于第一组竹书的学派性质，自出土以来便聚讼纷纭，迄今未成定论。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三种：儒家说、《墨子》佚篇说和单篇流行说。文章系统梳理上述三种学说的形成背景、论证路径和核心论据，并在此基础上评析得失，进而探讨长台关楚简学派性质研究的困境与前景。研究显示，该问题的复杂性不仅源于简文残缺的客观限制，更与战国秦汉时期古书流传方式、文献互见现象以及后世学术范式的影响密切相关。

关键词

长台关楚简，简牍学，儒家，墨家，学派性质，古书流传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the School Affiliation of the Changtaiguan Chu Bamboo Texts

Lei Zha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September 2,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17,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3, 2026

Abstract

The Changtaiguan Chu bamboo texts, unearthed in 1957 from Chu-state Tomb No. 1 at Changtaiguan in Xinyang, Henan, were long regarded as the only extant Warring States bamboo manuscripts prior to the discoveries of the Guodian and Shanghai Museum Chu slips, thus holding extremely high scholarly value. Two groups of slips were found in this tomb: the first contains a bamboo manuscript,

and the second comprises a tomb inventory, a classification that has not been disputed by scholars. However, the school affiliation of the first group has been vigorously debated since its discovery, and remains unresolved to date, with three main positions emerging: the Confucian school, the lost chapter of the Mozi, and the independent single-chapter circulation theor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background to the formation, argumentative strategies, and core evidence of these three views, and on this basis evaluates their respectiv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spects of determining the school affiliation of the Changtaiguan texts, and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complexity arises not only from the objective limitations imposed by the fragmentary state of the text on the bamboo slips, but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odes of textual transmission in the Warring States and Qin-Han periods, the phenomenon of overlapping passages among different works, and the influence of later scholarly paradigms.

Keywords

Changtaiguan Chu Bamboo Text, Bamboo and Wooden Slip Study, Confucianism, Mohism, School Affiliation, Transmission of Ancient Tex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长台关楚简出土于河南省信阳市长台关镇小刘庄一号楚墓。该墓于 1956 年 3 月为当地农民打井时偶然发现,随后由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组织实施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及出土器物的风格特征,考古学界将其定为战国中期偏早的封君一级贵族墓葬。该墓随葬品极为丰富,涵盖乐器、车马器、兵器、漆木器、铜器、铁器、陶器、玉器、竹器等诸多品类,充分反映了墓主人生前较高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在众多随葬品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两组战国楚竹简的出土。第一组竹简为古书,共计 119 枚,因出土时遭受严重践踏,全部残断,残存约 470 字。竹简宽度在 0.7 至 0.8 厘米之间,厚度约 0.10 至 0.15 厘米,残存长度不一,最长者为 33 厘米。学者推测,原简长度约为 45 厘米,每简约容 30 字。简上原有三道编绳痕迹,编绳已腐朽无存。第二组竹简为遣册,共 29 枚,保存状况相对较好,但因墨书为单行且字迹模糊,可辨认者约 957 字,内容主要为随葬物品的清单。学界对于两组竹简的基本分类及其各自性质,并无分歧。然而,对于第一组竹书的思想归属,亦即其学派性质问题,自竹书公布以来便一直处于激烈的争论之中,至今尚未取得共识。

竹书内容的公布经历了较长的过程。1957 年 9 月,《文物参考资料》首次刊布了两组竹简的图版[1]。1959 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河南信阳楚墓出土文物图录》[2]一书,其中收录了该墓出土文物及竹简的照片。1986 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更为系统的考古报告《信阳楚墓》[3],完整公布了该墓出土文物的情况及竹简照片与释文。1995 年,齐鲁书社出版了商承祚编著的《战国楚竹简汇编》[4],刊发了全部竹简照片、摹本、考释及字表,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较为完备的文献基础。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长台关楚简出土之时,战国竹书的发现尚属罕见。在郭店楚简(1993 年出土)和上博楚简(1994 年入藏)发现之前,长台关楚简是唯一经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战国竹书,因此被称为“最早的战国竹书”,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5], pp. 3-6, 197-198)。竹书所记内容为周公与申徒狄之间的对话体短文,涉及政治、伦理、教化等多方面议题,具有鲜明的思想史研究价值。然而,正因为其内容既呈现出儒家式的德治话语,又包含与《墨子》佚文相近的表述,加之竹简残断严重,使得对其学派性质的判

定成为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学术课题。

在进入具体学说的梳理之前，有必要对“学派”这一概念本身略作反思。先秦时期所谓“学派”，并非后世意义上的严密组织或固定教条。其时师徒相授，往往以口传心授为主，弟子各得其性之所近，文本亦多单篇流传，未有定本。一个文本可能同时被不同学派传习、引用，其思想倾向也常呈现出兼容与过渡的特征。因此，以某一关键词或某段文字与传世文献的相似性来判定其学派归属，需要格外审慎。文本的“所有权”在先秦并不明确，许多文献在流传过程中被不断增删改易，最终被归入某家某派，往往是汉代整理者分类的结果。明乎此，我们才能更准确地理解长台关竹书学派性质争论的实质。

概括而言，目前关于长台关楚简学派性质的主要观点有三种：其一，以李学勤早期观点及杨泽生等人为代表，主张竹书属于儒家文献；其二，李学勤在放弃儒家说之后另立新说，认为竹书应为《墨子》佚篇；其三，以李零为代表，主张竹书并非某家某派的专有文献，而属于以单篇形式流传的古书，应以《申徒狄》为名篇[6]。以下将分别梳理这三种观点的形成脉络、核心论据及后续发展，以便全面呈现该问题的学术论争图景。

2. 三种主要学说的梳理与评析

(一) 儒家说

儒家说是关于长台关楚简学派性质最早提出、最具持久影响力的观点之一。1957年11月，李学勤在《光明日报》发表《信阳楚墓中发现最早的战国竹书》一文，率先指出第一组残简属于“竹书”性质，并依据简文中出现的“先王”、“周公”、“三代”等词汇，判断其为“一篇属于儒家的论述政治道德文章[7]”。李学勤当时的主要依据在于，儒家学说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核心传统，对周公的政治人格与礼乐制度推崇备至，而简文以周公为对话主体，内容围绕治国理政展开，语言风格亦与传世儒家文献相近，故将其归入儒家范畴。

与李学勤同时期，史树青在《信阳长台关出土竹书考》一文中亦表达了相近的判断。他指出：“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其中一部分是记载关于西周初期大政治家周公的一些言论……我们从文中的‘戈人格上，则刑戮至’……和‘天子’‘卿大夫’‘君子’‘先王’‘三代’等词句看，它可能是春秋战国之际有关儒家政治思想的一篇著述，其中心内容是阐发周公的政治思想[8]。”史树青的观点较李学勤更为具体，不仅在关键词统计上佐证了儒家属性，还从文章主旨层面强调了对周公政治思想的阐发，实质上将竹书视为儒家政治哲学的一种早期表达。

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楚简整理小组在197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同样采用儒家说，但其论证路径与李、史二人有所不同。该小组学者认为竹书内容“与子思、孟轲的思想仿佛”，从而将竹书与思孟学派相联系。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最早注意到《太平御览》卷八百零二中收录了一段《墨子》佚文，内容为“周公见申徒狄曰：贱人强气则罚至”，其语气与竹书极为相似。这一发现本可导向墨家说，但该小组基于当时特定的学术语境，仍将竹书定性为“反映战国中期所流行的儒家思想[9]”。

进入21世纪，杨泽生在《信阳长台关第一组38号和3号研究》一文中重新为儒家说提供了更为细致的文献学论证。他通过对第38号和3号简的专门研究，指出简文所记古代教学内容及年限与《礼记·内则》《大戴礼记·保傅》等儒家典籍记载相近；简文中“贱人”、“尚贤”等内容虽亦见于《墨子》，但在《荀子》等儒家文献中同样有迹可循。他还指出，简文中“狄”的用语习惯不见于《墨子》，而更接近儒家文献的表述方式，因此推论竹书仍应属于儒家作品[10]。杨泽生的贡献在于，他没有简单重复前人的宏观判断，而是从具体简文的用语、制度细节入手，试图在微观层面为儒家说提供语文学支撑。

李锐和卢坤在《信阳长台关楚简索隐》一文中，进一步推进了儒家说的释读工作。他们对竹简进行了重新释读与编联，将残简拼接为三段，认为其中大部分内容实为孔子与子夏的问答。他们指出：“即

便这些部分没有太多的联系,由子夏问和论君子的内容,我们也会较倾向于认为此篇应属于儒学作品[11]。”这一判断将竹书的主体内容从周公与申徒狄的对话框架中部分抽离,重新锚定于孔门师徒问答的传统之中,为儒家说提供了新的文本依据。

此外,《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1949-2019)》的编者们也从简帛研究的前沿动态出发,指出《安徽大学藏战国楚简》公布的相关信息显示,与长台关竹书内容相近的文献在战国时期多为儒家传习系统有关,因此认为长台关竹书为儒家文献的可能性更多一些([5], p. 5)。

(二) 《墨子》佚篇说

《墨子》佚篇说的形成,与前述中山大学学者发现《太平御览》所引《墨子》佚文一事具有直接关联。尽管中山大学学者本人最终未采纳墨家说,但他们的发现为李学勤后来的学术转型提供了重要契机。

李学勤在1990年发表的《长台关竹简中的〈墨子〉佚篇》一文中,正式放弃了此前所持的儒家说,转而主张竹书为《墨子》佚篇。他明确指出,既然中山大学学者发现简文中的一段话与《墨子》佚文“周公见申徒狄曰,贱人强气则罚至”高度相似,“这组简非常有可能就是《墨子》的佚篇了”。随后,他从多个角度为这一新说提供论证:其一,词汇学层面,李学勤指出,“贱人”一词在先秦文献中虽非绝无仅有,但多见于《墨子》,而罕见于儒家核心典籍。他认为,这一词汇使用的频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文献的思想归属;其二,思想史方面,李学勤认为,简文中体现的尚贤主张与《墨子》的核心思想高度一致,墨家主张“尚贤”,强调任用贤能之士不分贵贱,而简文中有关“贱人”的讨论正可置于这一思想脉络中加以理解;其三,文献互证层面,李学勤指出,传世文献中保存的《墨子》佚篇材料虽不完整,但足资对照,竹书与佚文之间的文本重合度已达到不可忽视的程度,不能仅以偶合解释[12]。

2001年,何琳仪在《信阳竹书与〈墨子〉佚文》一文中,对1-01、1-02号简进行了重新释读,进一步为《墨子》佚篇说提供了文字学支持。他认为,《墨子》佚文中有借申徒狄之口表达“贱人何可薄也”的墨家主张,而竹书中关于“役夫贱人”之中也可能存在“上贤”的记载,正是这一主张的具体论证[13]。何琳仪的贡献在于,他将竹书的墨家属性从外在的文本相似性推进到思想论证的内在一致性层面,使《墨子》佚篇说在义理上更具说服力。

为更直观地呈现简文与《墨子》佚文的关系,兹将相关文句并列分析。长台关竹书1号简中,何琳仪释读出“役夫贱人”之语,并认为其下可能有“上贤”的记载;而《太平御览》卷八百零二所引《墨子》佚文作“周公见申徒狄曰:贱人强气则罚至”。两者均以“贱人”为对话核心,但语境侧重有所不同。长台关简将“贱人”与“上贤”相连,强调从贱人中选拔贤能;《墨子》佚文则言“强气则罚至”,侧重对贱人悖逆行为的惩戒。若进一步比对《墨子·尚贤中》“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之语,可见墨家尚贤主张确有打破贵贱界限的倾向。然而,《荀子·王制》亦云“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同样包含贱人可举、贵人可废的思想。因此,“贱人”一词虽在《墨子》中用例较多,但并非墨家独有,单纯依赖词汇频率判定学派归属,仍有风险。

《墨子》佚篇说的学术价值在于,它较为充分地回应了儒家说所无法完全解释的文本重叠现象。如果仅以思想倾向判定学派归属,则无法说明竹书与《墨子》佚文之间会存在如此高度的文字重合。该说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直接而简洁的答案:竹书本即《墨子》的佚失篇章。然而,反对者指出,战国时期古书互见现象极为普遍,一段文字同时见于不同学派的文献中并不足以证明文献归属。此外,简文中部分内容与今本《墨子》的思想并非全然一致,亦为《墨子》佚篇说留下了可供质疑的空间[9]。

(三) 单篇流行说

与儒家说和《墨子》佚篇说均试图将竹书归入某一已知学派的路径不同,李零在《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更具方法论反思意识的第三种观点——单篇流行说。

李零首先对李学勤的论证进行了系统剖析。他认为,李学勤所依据的佚篇可能是传本的发挥,也可能是传本的素材,但无论哪种情况,都不能直接推导出竹书原属于《墨子》这一结论。李零指出,战国秦汉时期的古书多以单篇形式行世,许多文献在流传过程中被陆续编入不同学派的总集或丛书之中,因此一篇文献的思想倾向与其最终被归入的学派之间并不必然存在对应关系。基于这一认识,李零主张,长台关竹书很可能只是周公与申徒狄问对的一种,简文篇题当以《申徒狄》更为适合[14]。在他看来,与其强行将竹书归入儒家或墨家,不如承认其作为单篇流行文献的独立身份。这种做法既避免了过度归类的学术风险,又更符合战国时期古书流传的实际情况。

田河在《信阳长台关出土竹书研究概述》一文中,对李零的观点表示明确赞同。他认为,无论将竹书定为《墨子》佚文还是儒家作品,学者们都各有所本,莫衷一是,相较之下李零的单篇流行说更为稳妥,也更具解释力([5], p. 5)。田河的判断反映了学界对于该问题长期争论未果的一种务实态度。

然而,《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1949-2019)》的编者们对李零的具体篇题拟定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信阳竹书1号、2号简反映申徒狄的思想确无问题,但其他竹简内容与《礼记·内则》《大戴礼记·保傅》内容相似,恐不能论定为申徒狄一人之思想。他们援引张家山汉简《盖庐》为例,该简记载了阖闾与伍子胥的对话,但竹简自带篇题《盖庐》(即阖闾),由此例类推,撮取1号简《周公》为题,或许比《申徒狄》更为适合[15]。这一观点虽与李零在具体命名上存在分歧,但在“单篇流行”这一基本判断上实则殊途同归。

单篇流行说最大的贡献在于,它从文献流传的制度性层面重新审视了学派归属问题,打破了“非儒即墨”的二元框架,使研究视野从思想分类学转向文献文化史。然而,该说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虽然较好地解释了为何竹书同时呈现儒、墨两家思想特征,却未能为竹书的思想内容本身提供更为明确的定位,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方法论上的审慎回避了思想史层面的判定。

3. 余论

综上所述,长台关楚简学派性质问题的争论已持续六十余年,三种主要学说各有所据,亦各有局限。纵观这一学术史进程,以下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首先,古书互见现象的普遍性为学派归属研究设置了天然的方法论障碍。明代郎瑛在《七修类稿》卷二十三“秦汉书多同”条中,已敏锐地观察到战国秦汉古书内容相重的现象,并将其归因于当时书籍未广泛刊刻、各家传抄过程中彼此取鉴的传播生态。现代学者李锐亦在《“重文”分析法评析》一文中指出,仅仅依靠文本相似性来判断文献归属,容易忽略战国学术流动性和开放性的基本特征。对于长台关竹书而言,其与《墨子》佚文的高度重合固然引人注目,但在古书互见的大背景下,这一重合究竟是同源文本的证据,还是后世辑录的结果,仍需审慎辨析[16]。

其次,竹书残缺的客观条件严重限制了学派的精确判定。长台关竹书出土时已全部残断,仅存约470字,且无法缀合为完整篇章。学者们反复讨论的核心文本,实际上集中于1号简、2号简等有限材料。在竹书大部分内容已佚失的情况下,仅凭只言片语推断整篇竹书的学派属性,无异于“窥豹一斑”,其结论必然带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这一困境也提醒我们,简帛研究中的学派归属问题,有时或许不应以达成共识为唯一目标,而应承认材料本身的局限,在适当的学术审慎中推进相关问题的探讨。

再者,不同时代学术范式的影响亦不可忽视。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学者们对出土文献的学派定性往往较为直接,结论也较为明确。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简帛研究的学科化与国际化,学者们的方法论意识明显增强,对学派归属问题也趋于审慎多元。这一转变本身即是学术进步的体现。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学派性质问题的争论并未削弱长台关竹书的学术价值。相反,正是由于这一争论持续不绝,才使得学界对竹书的文字释读、简序编联、思想内涵等各方面不断深化认识。无论竹书

最终被归于儒家、墨家，抑或视为独立流传的单篇文献，其作为战国中期思想史珍贵见证的地位不会改变。未来研究的突破，或许有赖于更多战国简帛材料的出土与公布，也或许需要学者们在方法论层面进一步超越“学派归属”的传统提问方式，从文献流传、知识生产、思想对话等更为开阔的视角，重新审视长台关竹书在战国文化版图中的位置。

参考文献

- [1]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 我国考古史上的空前发现——信阳长台关发掘一座战国大墓[J]. 文物参考资料, 1957(9): 54-58.
- [2]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 河南信阳楚墓出土文物图录[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59: 141-144.
- [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信阳楚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124-136.
- [4] 商承祚. 战国楚竹简汇编[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5: 133-178.
- [5] 李均明, 刘国忠, 刘光胜, 等. 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1949-2019)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3-6, 197-198.
- [6] 袁逢. 信阳长台关一号墓竹书学派性质探论[D]: [硕士学位论文]. 曲阜: 曲阜师范大学, 2010: 1.
- [7] 李学勤. 信阳楚墓中发现最早的战国竹书[N]. 光明日报, 1957-11-27(3).
- [8] 史树青. 信阳长台关出土竹书考[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63(4): 89-92.
- [9] 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楚简整理小组. 一篇浸透着奴隶主思想的反面教材——谈信阳长台关出土的竹书[J]. 文物参考资料, 1976(6): 76-79.
- [10] 杨泽生. 信阳长台关第一组 38 号和 3 号研究[C]//李学勤, 谢桂华. 简帛研究二〇〇一.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1-5.
- [11] 李锐, 卢坤. 信阳长台关楚简索隐[J]. 华夏考古, 2016(3): 125-129.
- [12] 李学勤. 长台关竹简中的《墨子》佚篇[C]//四川大学历史系. 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 成都: 巴蜀书社, 1990: 1-8.
- [13] 何琳仪. 信阳竹书与《墨子》佚文[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1): 27-29.
- [14] 李零. 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191-207.
- [15] 田河. 信阳长台关出土竹书研究概述[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6): 52-54.
- [16] 李锐. “重文”分析法评析[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1): 127-134+160.